

# 指明方向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

商务印书馆

# 指 明 方 向

1959—1961 年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

本馆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 年·北京

Harold Macmillan  
**POINTING THE WAY**  
Macmillan London Ltd, 1972

**内 部 发 行**

**指 明 方 向**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  
本馆翻译组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8 印张 342 千字

1976 年10月第1版 1976 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17·203 定价: 1.65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忆录的第五卷(《指明方向》)。作者记述了从1959至1961年间他继任首相前后亲自处理的国内外的重大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他筹备提前大选中,国内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英国与西欧共同市场六国之间的关系;英、美、法三国与苏联举行的最高级会议;柏林危机,裁军问题,禁止核试验,以及由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而发生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危机等问题。作者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忆,竭力为其对内的反动统治和对外的殖民统治、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辩护,并为自己歌功颂德。书中引用了大量与各国首脑来往的书信、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年鉴等材料,这些材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特别是英国的内外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1959 年大选 .....   | 1   |
| 第 二 章 | 首相生涯 .....       | 29  |
| 第 三 章 | 六国与七国 .....      | 54  |
| 第 四 章 | 走向最高级会议的道路 ..... | 74  |
| 第 五 章 | 西方最高级会议 .....    | 112 |
| 第 六 章 | 非洲之行 .....       | 140 |
| 第 七 章 | 失败了的最高级会议 .....  | 215 |
| 第 八 章 | 刹一刹车 .....       | 262 |
| 第 九 章 | 巴黎会议的余波 .....    | 286 |
| 第 十 章 | 英联邦危机 .....      | 344 |
| 第十一章  | 新总统 .....        | 369 |
| 第十二章  | 缘木求鱼 .....       | 436 |
| 第十三章  | 海湾风暴 .....       | 462 |
| 第十四章  | 赫鲁晓夫在行动中 .....   | 470 |
| 第十五章  | 乡邸聚会 .....       | 496 |
| 第十六章  | 非洲斗鸡场 .....      | 520 |
| 第十七章  | 女王的雄心壮志 .....    | 553 |

# 第一章

## 1959 年大选

9 月 8 日，即我从巴尔莫勒尔堡返回后的第二天，内阁在下午三时举行会议。这是一次简短而正式的会议。我在会上报告了早日解散议会的请求和女王的批准。唐宁街十号立即发出公告，定于 9 月 18 日解散议会，10 月 8 日举行选举。根据近来的惯例，我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解释向女王作这项请求的理由：

1955 年 5 月选出的议会，现在已是经历了第五个年头。因此必须在今年秋季或明年年初举行大选。

从国内事务来看，没有理由不在此秋举行大选。但是大选的日期也必须根据国际形势来考虑和决定。眼前将有一些重要的国际谈判。人民显然应当有机会尽可能地及早决定谁将代表他们去参加这些谈判。

这个声明至少解释清楚了我和我的同僚们希望得到选民新的委托的一个主要理由。由于知道反对党领袖盖茨克尔在莫斯科，我在内阁会议开完之后立即给他发了一个电报，把拟定的日期通知他，让他可以决定是否继续或者缩短对莫斯科和华沙的访问。

公告发布之后，我从世界各地的朋友那里收到许多表示善意的函电。其中有两件使我特别感到高兴。第一

件是鮑勃·孟席斯<sup>①</sup>于9月14日发来的,他谢谢我写给他的关于艾森豪威尔来访的长信,接着说:

我从报上注意到,伯特·伊瓦特<sup>②</sup>老兄已经公开地向休·盖茨克尔表示了祝愿;这将使你遭受足够的损害。我不愿以公开的函电使你困窘,但我的心情你是十分理解的。

第二件来自提兹河畔斯托克顿的一个保守党的老工人。除了对我表示良好的祝愿之外,她回忆起一件小事,使人对过去浮想联翩:

1923年,当你第一次竞选议员时,我正住在我的家乡提兹河畔斯托克顿。我荣幸地陪伴多萝西夫人在这个城镇的一些最贫苦的地区作巡回竞选,她到处受到特别亲切和殷勤的接待。我记得那时天气寒冷,在厨房的炉火边,围坐在铺满报纸的桌前喝茶,是十分舒服的。多萝西夫人可能记得,我们曾上楼去看望一位卧床不起的老太太。当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sup>③</sup>在凤凰公园被暗杀时,她曾是都柏林总督府的女仆。这位可怜的老太太看到她时是多么地高兴呀。<sup>④</sup>

几星期之前,据报财政部正考虑发行两镑面额的纸币。虽然这个建议并无多大害处,但在这个时候我却本能地反对它。因此,我在8月1日写了一封短信给财政大臣:

---

① 即罗伯特·孟席斯,当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译者

② 即赫伯特·伊瓦特,当时是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的领袖。——译者

③ 卡文迪什(1836—1882年),于1882年5月6日在爱尔兰任职时遇刺。——译者

④ M. J. 斯坦斯比太太 1959年9月14日信。

我又考虑了一下发行两镑面额钞票的问题。我不愿在选举以前为着钞票问题去惹是生非，也不愿意听到关于它的任何议论。普通人民将会以为我们在摆弄他们的金钱。据说，德文郡老公爵(哈蒂·塔蒂)①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当他想不起再说什么的时候，就用拳头猛击讲台并大声叫喊：“我坚决不允许搞乱有信用的发行。”这话博得听众的高声喝采，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回忆一下为争取改变历法②的著名选举。它的口号是：“还我十一天。”

两镑面额钞票的发行，显得是公开承认货币贬值。它将直接挫伤对储蓄的兴趣。

还有一点，虽属次要，但也许还值得提一下：9月9日，我通知各部大臣，提醒他们要正确使用交通设备。因为在整个选举期间，政府继续掌权，这些设备仍归他们使用，对设备的任何滥用，都会招致物议。

### 公务车辆

在大选期间，各部大臣为了公务仍可继续使用由政府车辆服务处或其他方面提供的公务车辆；但在与竞选有关的旅行中，不得使用此种车辆。大臣在自己的选区中，即使为了公务，也不宜使用公务车辆，除非他由于紧急公务，从选区中被突然召回。

---

① 即斯潘塞·康普顿·卡文迪什(1833—1908年)，曾以哈廷顿伯爵闻名，自由党员。——译者

② 1752年9月，英国采用教皇格雷戈里八世在1582年颁行的历法(新历)，代替过去采用的凯撒颁行的历法(旧历)，新历比旧历推后十一天。  
——译者

飞机

• •

凡与选举有关的旅行，概不得使用飞机。

凡与选举和党派事务有关的旅行，所花的民航费用，不得由公款中支出。下列情况可以作为例外：由于紧急公务，大臣被突然召回部内，而当时并无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利用，则其空中旅行费用可以申请报销。

在为议会解散而拟定的授勋名单中，我很高兴得以把两个人的名字列进去。第一个是赫伯特·莫里森，他同意接受终身贵族<sup>①</sup>的加封。1940年在供应部时，我曾在他手下工作过。多年以来，我熟悉和尊敬他。过去，我们不论作为合作者或对立面在一起工作时，他对我都十分亲切殷勤。现在能够作出这点区区的报答，我由衷地感到快慰。

另一个是詹姆斯·斯图尔特，他接受了子爵之位。他从1923年起就在议会工作。在战争的大部分期间，他起初任苏格兰督导员，后来任总督员。从1951到1957年，他是最出色的苏格兰事务国务大臣。他在下院中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方面都很得人心。我们是连襟，但这并没有使我在作出这个推荐时感到棘手。

在现代议会制的条件下，存在着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的高度组织的政党，工作十分紧张繁忙，同时又要适当考虑下院内外拥护者的感情和意见，因此大臣们面临的最困难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公务。我有时注意到，在

---

① 终身贵族是贵族院(上院)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英王加封，性别不限，其爵位不能继承(世袭贵族则可以由长子继承爵位)。——译者

两大党中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大臣们一旦“穿上了小小的为时短暂的权力的外衣”,就容易忘记他们赖以获得职位并可望在将来继续任职的手段。在反对党中,党的领袖和基层群众通过在议会内外不断举行的会议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免除了操劳和直接责任,与选区和党组织经常保持接触。如果他们由于接触不到关于内外事务的官方情报而有不利之处,这也只是使他们更有行动的自由。但是,当一个执政党牢固地掌握权力时,它同后座议员和党组织的关系就立刻变得比较疏远和淡薄了。它必须小心谨慎地把政府机器的功能同政党的利益分隔开来。要保持许多事情赖以存在的文官制度传统的不偏不倚的精神,上述的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我就常常很小心地避免越过这条界限。尽管如此,如果大臣们开始采取过分超然或专断的态度,忘记了他们取得权力的来源,他们迟早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除了大臣、特别是首相在从事工作时具有这种重要的双重关系外,现代世界中事务的繁忙和紧张也使得难以保持适当的平衡。

由于这些考虑,我在 1957 年 12 月设立了我们所谓的“指导委员会”。这个组织由主要的大臣组成,并由保守党研究部配备了一个秘书处。它的成员是:巴特勒、霍姆、黑尔什姆、麦克劳德和总督导员爱德华·希思。秘书是迈克尔·弗雷泽,由彼得·戈德曼协助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处理日常事务,而是为下一次大选(不管它什么时候举行)准备竞选宣言。这两年里,共举行了十七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 1959 年 9 月 3 日开

的。委员会考虑了涉及各种问题的三十六个文件，其中有些是大臣们提出来的，其他则来自研究部。委员会接管了巴特勒于1957年2月成立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这个组织叫做“政策研究小组”，其主席是麦克劳德，莫德林是主要成员之一，另由杰克·西蒙、奥姆斯比-戈尔和伊诺克·鲍威尔协助。在这一时期中，由于这两个组织合并起来工作，共准备并讨论了竞选宣言的七个草案。第八个草案，也就是最后一个修订的草案，1959年9月8日在巴特勒代表我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在这些重要讨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广。虽然我想尽量去参加所有的会议，但是由于有许多事先约定要办的事和经常出国旅行，我当然做不到这一点。我十分感谢巴特勒在整个这一期间全力以赴地进行这项工作。我的主要贡献也许是给这一宣言拟了一个标题，而这个标题至少可以给人以自信的印象。宣言叫做《下一个五年》，于1959年9月11日公布。

整个说来，这个文件受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好评。它的好处在于简单明了。向全国提出的主要问题被归结为：

你愿意沿着已经为国内带来繁荣的路线继续前进吗？

你愿意现在的领袖们在国外代表你吗？

不管宣言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它同工党最初的主要宣传必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工党的这个小册子叫做《保守党的骗局》，它深文周纳，以一种凶恶的和差不多是十八世纪的文体攻击首相及其同僚。“麦克胡来先生，卫生

球首相”，这还不算是对我的经历和私生活的最不友好的抨击。其他大臣也受到同样尖刻的攻击。但是，在几天之内，这种竞选的手法，也象现代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一样，莫名其妙地显得过时了。它肯定没有得到报纸的什么支持，在选区里变成了使他们自受其害的武器。黑尔什姆在奥利弗·普尔协助下，以出色的才能主持着党组织，他立即提出严肃而有力的抗议。我深感兴趣地看到，在1970年的大选中，工党又重复了这种错误，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工党的正式宣言草拟得比较得体，也很少涉及私人的词句。这个文件有力而又娓娓动听地显示了盖茨克尔渊博的经济知识。它的主题开展得既有气魄而又巧妙。但是，它也包含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在选举过程中使盖茨克尔遭到不利。工党要为之奋斗的主要建议，是一个雄心很大的社会改革纲领，其中一部分是把已经发表过的计划具体化了。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猛增年金，据称其费用（连同纲领上的其他各项费用）不需要增加任何赋税即可筹到。

一切大选都是多少有点乏味的事情。这次是我参加过第十次大选，并且将证明是最后的一次了。今天的大臣们由于试图兼顾日常工作和竞选的高度紧张，负担已很沉重。除此之外，对整个进程还有一种奇怪的虚幻感觉。不仅党的命运，而且有关的个人的前途都还在未定之天，这必然使人思想很难集中。但是我总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如何避免把复杂的问题加以夸大或过分简

单化，而在竞选的过程中，那是很容易这样做的。这个国家竞选的确切日期幸而限制在三周左右。我们的确感到幸运的是，用不着象美国那样旷日持久地从事竞选运动。尽管如此，随着感情的日益激动，这几星期也是忙得晕头转向。对于领导人物来说，又别有一种不利之处，而一般的候选人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在我早期参加的大多数竞选运动中，我把活动限制在自己的选区以内，不必花额外的精力乘火车和汽车作差不多纵贯全岛的旅行，不必夜间在大城市发表主要演说之后，日间又要插进若干小型的集会。此外，作为一个后座议员，还可以一个晚上在三个会场上去重复同一篇演说。报刊从不报道他们的演说，因此他们既不必变换主要论点，也不必改变装饰那些论点的语言。甚至讲词中的笑话也可以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反复讲述。只有我可怜的妻子经常要受这种重重复复的演说的折磨。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她，能不能或者愿不愿意作一次政治演说。她回答说，“不，我不会演说；但我差不多是一个职业的听客。在我所参加过的我父亲、哥哥和丈夫的竞选运动中，我总是坐在讲台上听他们演说。而且我不得不说，”她沉思了一下又说，“他们老是重复来重复去。”但是，现在我需要至少在形式上试着去变换一下，在夜间或乘火车旅行时，准备对盖茨克尔在前一晚所作的演说进行答辩或反驳。

我试图自始至终地保持实事求是和心平气和的语调，9月18日我在布朗利就这样开始了竞选运动。

演说经过很仔细的准备，并有一些很好的材料，特别是

关于我早期在下院的活动,以及党和国家所起的变化。<sup>①</sup>

两种新的力量在前此的几次选举中已起过一些作用,现在也开始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意义。第一种力量是民意测验,第二种力量是电视的利用。那时以著名的盖洛普博士的名义搞的民意测验占统治地位;那些由《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主持的民意测验,一般并不认为是权威。现在已经有六、七种这样的测验系统,发展得很完善,而且都同样很有影响。虽然那些被测验者都是从不同的区域和类别中仔细挑选出来的,今天这些占卜学家还不能被认为具有非常高的数学的准确性。说实在的,看来他们的活动与其说是近乎天文科学,倒不如说是近乎中世纪的占星术。同时,他们公布的调查结果是很有影响的,它不但反映民意,甚至还往往会左右民意。因此,竞选双方的政治机构都高度注意这些测验。

我们所有的人昨天都有点沮丧,因为《每日邮报》的“盖洛普测验”表明,我们的领先票数从百分之七降到百分之三点五。但是今天与之竞争的《每日快报》的测验表明,我们仍然保持着百分之七的领先。可见专家们之间有着很激烈的斗争。普尔勋爵昨天下午来了,他很镇静,但仍认为我们不久即应加强攻势。<sup>②</sup>

在电视方面,竞选开头时我们的确比对手差。

工党昨晚搞了一个很成功的电视广播,比我们搞的好得

---

① 1959年9月18日。凡引自我私人日记和其他个人备忘录中的,都在每条下标明了日期。

② 1959年9月22日。

多。盖茨克尔越来越精通此道。他们的竞选运动至今专门使用一些骂人的脏字眼(反对保守党和实业界人士),并向老年人许愿。他们想把这场大选搞成一个养老金选举。我们一方面必须对这一侧攻进行抵御,但又绝对不能离开主要的题目——和平与繁荣。<sup>①</sup>

我们的第一次电视广播是几个人合在一起演出的,也就是把我和五位同僚在我的苏塞克斯家中的情景拍成了一部电视影片。我们原先是想把它搞成一次亲切而有益的讨论,让公众了解大臣们对各项事务的一些看法,结尾是外交大臣同我对国际形势最近的发展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但是,尽管我们做了一切努力,这次广播还是失败了,它好象很做作,效果不佳。因此还要大大依赖今后在电视中和观众的见面。

9月26日,我发表了一个无线电广播演说,集中解释竞选宣言。这次产生了相当好的效果。但是比起电视来,当时(我想现在也是这样)无线电广播的听众较少,给人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

作为党主席的黑尔什姆和作为副主席的普尔,是两大支柱。黑尔什姆以漂亮的公开演说激励了全党,而普尔则镇静沉着,办事敏捷,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党的总部里,以一个参谋长的干练手法指挥着各地区和各选区。

我现在开始了竞选旅行,周末返回伦敦。

精疲力尽的一周刚刚结束。我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斯旺西作了长篇演说(这些演说需要事前准备好并散发给

---

<sup>①</sup> 1959年9月22日。

各报)。我在伯里、海伍德、米德尔顿、奥德姆、海德、斯托克波特、希夫纳尔、特坦霍尔、沃尔索尔(以上第一天)、布罗姆斯格罗夫、伍斯特、杜克斯伯里、斯特劳德、奇平索德伯里(以上第二天)等地作了十五分钟的“短暂停留”演说。在布朗利,我昨天还作了一个录音广播,并在星期五参加了两次会议。

不幸,在一次露天集会上,扩音器要末失灵,要末是遭受破坏,因此我把嗓子喊哑了。理查森医生(他度完假期后已回来照看我)给了我一些好药。今天〔星期日〕我遵嘱躺了一整天。

此外,我还要准备八篇或十篇报纸文章。如果没有乔治·克赖斯特,简直无法完成。这个人真有才华。他也是一个极易相处的朋友和伙伴。他同我一块儿旅行,熬着夜反复听我口授文章,头脑里主意很多,词藻丰富……

毫无疑问,最初十天我们有些失利。但是我们的骑兵前哨会冲破任何坚固的防线,一定能够长驱直入。

从其政策来看,工党许了一个很大的愿,一下子要为养老金领取者增加十先令。从养老金领取者的人数来考虑,这是一个危险的“压力集团”。如果工党获胜,他们不是胜在其他方面,而正是胜在这个许愿上。我采取了唯一的方针,并声明不同他们去比赛喊价。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我们的弱点。

他们的电视表演比我们的精彩,他们对一些在“财产”方面干过声名狼藉交易的可疑人物散布的流言蜚语都还无关紧要。那些可疑的人物甚至可能缩回去,因为他们都是工党的私人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报纸直到现在还对他们有偏向,主要是因为报界从运输大厦<sup>①</sup>比从我们中央办

---

① 运输大厦系英国工党总部所在地。——译者

公室搞到的消息要热闹些。我们正在想法纠正这一情况。

我还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在头十天里是失利的。但究竟失利多少，我们无法断言。盖洛普和联合民意测验在下一周肯定要反映出来。如果我们都保持镇静，一切就会顺利；如果惊慌失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躺在唐宁街十号这间房子的床上（我在这儿已经住了近三年），心里的感受是有些异样的，不知道十天以后还能不能在这里。<sup>①</sup>

普尔和总督导员晚上来看我。“我们准备把竞选运动略微‘促进’一下，但仍保持同样的总调子。”<sup>②</sup>《每日邮报》9月28日发表的民意测验票数，使我们的领先票数降低至百分之二，但我仍然颇有信心。

就象任何一个反对党领袖所易于遭到的那样，盖茨克尔现在也开始跌入陷阱，因为他争论说，为养老金和其他社会改革而增加的开支，可以通过更严格地控制对“企业开支”扣除所得税的办法来筹措。这就给我一个好机会来进行反击，而不必损害我们在整个大选中力图贯彻的那种标准。在竞选旅行中，我得以在阿克顿、阿克斯布里奇、伊林和奇斯威克作的一刻钟演说（和在别的选区作的三、四次访问）中回击了。

盖茨克尔关于从“企业开支”中搞到这笔钱的荒谬想法。如果真能那样，他为什么不在1951年就那样做，却在这一年里增加了近四亿镑的税收呢？<sup>③</sup>

---

①② 1959年9月27日。

③ 1959年9月28日。